

毛泽东一九三六年 同斯诺的谈话



毛泽东一九三六年 同斯诺的谈话

关于自己的革命经历和红军长征等问题

人 民 出 版 社

毛泽东一九三六年
同斯诺的谈话

关于自己的革命经历和红军长征等问题

人民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4.625 印张 77,000 字
1979 年 12 月第 1 版 1980 年 2 月北京第 2 次印刷
印数 5,001—150,000

书号 3001·1726 定价 0.44 元

前 言

本书汇集了美国记者斯诺所记述的伟大领袖和导师毛泽东同志一九三六年在陕北保安同他的几次谈话。斯诺在宋庆龄先生和我们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地下党组织的帮助下突破国民党的封锁线，于一九三六年七月间来到当时中共中央和中国工农红军总部所在地的陕北保安县城。他是来到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的第一个外国记者。毛泽东同志和周恩来同志对他的采访活动甚为重视，他来后不久，毛泽东同志在七月十六日就接见了，并在几天内同他进行了关于当时抗战形势的谈话，在九月二十三日，进行了关于党的统一战线政策问题的谈话。斯诺在陕北的三个多月里，进行了广泛的采访活动，还到前线部队去过，于十月间回保安。这时，毛泽东同志又同他谈了关于自己的革命经历和长征的主要经过情况。这些异常珍贵的谈话，不仅有重大的现实意义，而且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早在抗日战争爆发前一年，即一九三六年七月，毛泽东同志以马列主义的真知卓识，科学地深刻地分析

了行将到来的抗日战争的形势和开展国内、国际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的必要性与可能性，也指出了持久战的战略，和中国必胜的根据。后来抗战发展的进程，完全证实了他的预见的正确性。这是马列主义科学分析的深邃的洞察力和预见力的典范，是毛泽东同志半个多世纪领导我国革命缔造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正确的革命路线的光辉范例之一。

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三八年五月写《论持久战》这篇著作时曾经引用了他同斯诺谈话的几个段落。他根据抗战十个月的经验，对于谈话中所作的论述作了进一步的有系统的发挥，写成了《论持久战》这部指导抗战直到完全胜利的光辉的名著。这一著作的主要论点，毛泽东同志早在两年前同斯诺的谈话中，就已经指明了。

一九三六年十月间，斯诺从前线部队回来，多次请求毛泽东同志谈谈自己的革命经历，他考虑了很久才同意了。他谈了自己的成长过程以及红军的长征经过。毛泽东同志的这次叙述，不仅是无比的珍贵，而且是如何对个人成长进行历史唯物主义分析的光辉典范。他没有任何的矫饰，辩证地唯物主义地阐述了自己如何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统治下的中国黑暗旧社会中斗争过来，如何从一个早期不可避免地受到旧社会的旧思想的某些影响的少年成长起来的进程。我们从这里可

以看到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人民的伟大的革命导师和革命领袖光辉灿烂的发展进程。毛泽东同志后来在一九六二年说：“如果有人说，有那一位同志，比如说，中央的任何同志，比如说我自己，对于中国革命的规律，在一开始的时候就完全认识了，那是吹牛，你们切记不要信，没有那回事。过去，特别是开始时期，我们只是一股劲儿要革命，至于怎样革法，革些什么，那些先革，那些后革，那些要到下一阶段才革，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都没有弄清楚，或者说没有完全弄清楚。我讲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在民主革命时期艰难地但是成功地认识中国革命规律这一段历史情况的目的，是想引导同志们理解这样一件事：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的规律的认识，必须有一个过程。必须从实践出发，从没有经验到有经验，从有较少的经验到有较多的经验，从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到逐步克服盲目性、认识客观规律，从而获得自由，在认识上出现一个飞跃，到达自由王国。”这是何等深刻的正确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教导。毛泽东同志正是本着这样的精神来叙述自己的革命经历的。

斯诺在《西行漫记》中关于长征的记述，虽然基本上是根据毛泽东同志的阐述，但可以看出他还吸收了其他同志所提供的具体材料，并且是用他自己的语言写的。毛泽东同志是遵义会议后直接指挥工农红军，转

败为胜，取得历史性伟大胜利、成功地结束长征的英明统帅。长征中召开的遵义会议，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和周恩来、朱德等同志对毛泽东同志的有力支持之下，结束了王明路线的统治，改组了党中央的领导，奠定了毛泽东同志在全党全军的最高领导地位，从而在革命的紧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工农红军，挽救了革命。以后毛泽东同志又领导党和红军粉碎了张国焘的退却逃跑路线和分裂党、分裂红军的阴谋，使英勇的长征能以伟大的胜利而告完成。如果不是贯彻执行毛泽东同志的正确的政治路线和巧妙的战略战术，那么英勇长征的工农红军，就有可能象石达开的太平军那样被反动派所消灭。我们的长征的胜利和往后的革命斗争的伟大胜利就根本谈不到，我们革命不知会被推迟多少年，中国人民不知要再吃多少苦。斯诺的这一部分记述虽然没有足够地反映毛泽东同志在长征中所起的领导作用，但是看了长征路上的惊心动魄的斗争，我们也就能进一步了解毛泽东同志在缔造我们国家的革命历史上的伟大功勋和毛泽东同志的思想、路线的英明正确，更有力地推动我们对毛泽东思想的学习。

斯诺写的以毛泽东同志谈话为主干的《西行漫记》一书，一九三七——三八年在伦敦和纽约分别出版后，立即轰动了全世界，受到了世界各国的重视和全世界广大读者的热烈欢迎，成为当时国际上发行最广、最多

的著述之一。该书当时在上海出版的中文译本，毛泽东同志曾经看过，并曾在延安的一次干部会议上提到这本书是外国人报道中国革命的最成功的两部著作之一，对它作了肯定的评价。他说，《西行漫记》是一本真实地报道了我们情况，介绍了我们党的政策的书。这本书后来被译成世界各主要国家的各种文字，在国际上广泛传诵，全世界人民从这里了解到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革命路线的一些重要情况，促进了国际上反帝革命统一战线的发展。

斯诺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而是一个自由主义的美国新闻记者，可是，他是一个有正义感的新闻记者。他在几十年的新闻采访活动中，对于我们党和毛泽东同志所领导的中国革命运动采取了热情友好的态度。特别是通过采访陕北的革命根据地，他亲眼看到了革命根据地人民、军队的艰苦卓绝的斗争，看到了毛泽东同志和周恩来同志（当时朱德同志不在保安）的伟大形象、英明领导和战斗生活，看到了许多革命干部为祖国、为人民而奋斗、牺牲的实况，使他的思想有了很大的进步。当斯诺开始进入陕北革命根据地的时候，他还怕村里的农民“共他的产”，分掉他所带的财物，但是当他离开根据地的时候，他感觉好象“不是回家，而是离家”了。此后他积极地宣传毛泽东同志所领导的革命事业，在国际上发生了极大的影响。毛泽东同志后

来提到斯诺说，他是在没有别人愿意来的时候到我们这里来，了解我们的情况，并通过提供事实帮助了我们。又提到他是头一个为统一战线所必需的、建立友好关系的工作铺路的人。他不仅是第一个广泛报道中国革命根据地和革命军队真实情况的外国记者，而且对推动中美人民友好，促成中美两国的对话起了良好的作用。由于他对中国的友好活动，五十年代他曾经受到美国国内亲蒋介石的反动集团的多方打击，并曾经被迫离开美国迁居瑞士。他是一九七二年在瑞士去世的。他临终时遗愿把他的一半骨灰葬在中国，他的墓碑现在就矗立在他曾经执教过的燕京大学校园——现在的北大校园——的未名湖畔。毛泽东同志和周恩来同志生前都曾对斯诺作过多次积极评价。斯诺先生是中国人民的好朋友。

毛泽东同志一九三六年同斯诺这几篇谈话的整理出版，对于我国广大群众，一定会有重大的意义。这几篇谈话，由于我自己是当时的口译者，而现在又是当事人中的仅存者，我感到自己有巨大的责任加以整理。我建议人民出版社把《西行漫记》所收录的毛泽东同志谈话以及斯诺当时发表在英文刊物上的、毛泽东同志同他的其他三篇谈话，汇编成一本书出版。

毛泽东同志同斯诺谈话时我只作了简要记录供口译之用。当时在座的虽还有与斯诺同来苏区的马海德

医生，但他只是在一边旁听，没有实际参加谈话；也没有其他人作速记或作记录，毛泽东同志是按照斯诺所提的问题，凭记忆而谈，没有写成成篇文字。斯诺按我的口译作了笔记。关于毛泽东同志个人革命经历部分，斯诺按照毛泽东同志的要求整理成文，由黄华同志译成中文，经毛泽东同志仔细审阅后作了少数修改，交黄华同志照改后退给斯诺。经过了四十多年，很可惜，现在这些有关的文字记录都找不到了。我自己记的东西，经过战争年代多次转移，也已荡然无存。现在我们根据斯诺在《西行漫记》一书中和《密勒氏评论报》、《美亚》杂志上发表的英文记述照译过来，在可能范围内作了某些校订工作。

斯诺根据毛泽东同志的叙述撰写的《一个共产党员的经历》，在《西行漫记》前后几种英文版本里，好些地方文字有出入，显然是斯诺自己后来作了修改。我们一般是采用最早版本的记述，只是个别地方采用后来一些版本的文字。还有个别地方，按我的记忆确实不符合毛泽东同志谈话原来意思，不能不作必要的订正。斯诺当时是通过我的口译，才了解到毛泽东同志谈话的内容的，如果我作为当时的口译者对斯诺的个别记叙文字作些必要的修订，以便更准确地表达毛泽东同志的原意，那么我想，要是斯诺今天还在，是不会反对的吧！

在这几篇记述中，有些人名、时间、地名不准确。毛泽东同志当时在没有使用任何参考资料的情况下进行口述，又经过斯诺用外文记述，发生某些差错是难免的。现在，我们尽可能地作了校正，对于这些校正都一一加注说明。

《长征》这一节，斯诺并不是采取直接引述毛泽东同志的话的形式，我们现在也就只能照他的形式移译了。

《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论统一战线》和《中国共产党和世界事务》三篇谈话记录，都是根据斯诺的英文记述译出的，只有《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中的有几段话是按照《论持久战》所引用的文字。二者基本内容完全一致，只是文字繁简不同。

斯诺所加脚注和正文中他所作的说明，其中有些是针对外国读者的需要而为中国读者不需要的，我们这里删去了。本书的脚注，除了注明是斯诺所作的以外，其余是我和共同做整理工作的同志们加上的。

在本书整理过程中，我们努力争取做到事实准确，文字清楚，但是由于我个人见识有限，力不从心；所以在一九七八年七、八月，我们印了几百份征求意见本，分送中央领导同志、各方面负责同志求教。不久我们便收到了好些同志的回示，特别是邓颖超同志给予了亲切的鼓励，提供了许多宝贵的意见，军事科学院的同

志提供了有关事实的订正意见。有好几位同志帮助我进行了仔细的事实查证、认真的文字校订。在这里，我虔诚地请求广大读者多多指出我们工作中所尚存留的这样、那样的缺点错误，以便在本书再版时进一步改正。

吴 黎 平

一九七九年八月

目 录

前言	1
一个共产党员的经历	1
一、童年时代	1
二、长沙时代	17
三、革命的序曲	31
四、国民革命时期	40
五、苏维埃运动	48
六、红军的成长	60
长征	74
一、第五次“围剿”	74
二、一个国家的迁移	81
三、大渡河上的英雄	87
四、过大草地	96
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	107
论统一战线	118
中国共产党和世界事务	124

一个共产党员的经历^①

一、童年时代

我交给毛泽东一大张关于他个人的问题表，要求他答复。我为自己这种打破砂锅问到底的做法感到不安。犹如一个日本移民官应为他的无礼感到不安而又

① 这篇以及下一篇关于红军长征经过的谈话，是在一九三六年十月间进行的，毛泽东同志就此同斯诺谈了十几个晚上。谈话通常从晚上九点多钟开始，未谈正文之前，毛泽东同志常谈一二个短故事（斯诺后来在写书的时候说他很遗憾没有把这些故事记下来）。谈到十一二点钟时，毛泽东同志招待他吃一顿便餐，有馒头和简单的菜，菜里有一点点肉，这在当时的困难条件下已是十分难得的了。对客人来说，这是夜宵。但对毛泽东同志来说，则是正常的晚饭。因为毛泽东同志为了指挥战争和领导全国革命工作的需要，往往在夜间工作直到凌晨才休息。毛泽东同志同斯诺谈话时，要我去作翻译。谈话时有正文，也插些故事、闲话，毛泽东同志的态度是那么平易近人，谈话又是那样生动活泼，逸趣横生，久久不倦。斯诺常说这是他生平经历过的最可宝贵的谈话。谈话一般都谈到夜间两点来钟。谈话时斯诺作了详细笔记。斯诺在陕甘宁边区，进行了广泛的采访活动，并曾到过前方的部队，最后于一九三六年十一月间离开边区。他返回北平后，以毛泽东同志的谈话为主干，利用采访所得的资料，写成了《西行漫记》（Red Star over China，直译是《中国上空的红星》）一书。

不自觉那样。

关于我提出的涉及不同事项的五六组问题，毛谈了十几个晚上，但几乎没有提到他自己和他在所叙述的一些事件中的作用。我开始感到：指望他为我提供这些细节是不可能的了；他显然认为个人是无关紧要的。他和我所遇见过的其他共产党人一样，往往只谈委员会、组织、军队、决议案、战斗、战术、“措施”等等，却很少谈到个人的经历。

有一段时间，我以为这种不愿详谈私事，甚至不愿详谈他的同志们的个人功绩，也许是出于谦虚，或者是对我有所顾忌或怀疑，或者是因为知道其中许多人头上悬有赏格的缘故。后来我才发现不是由于上述原因，而是因为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实在不记得这些个人琐事。当我开始收集传记材料的时候，我屡次发现，一个共产党人是能够说出他的青少年时代所发生的一切的，但是一旦他成为红军的一员之后，他就把自己抛在一边了；如果你不重复地问他，就不会再听到关于他自己的事情，而只听到关于红军、苏维埃或党的故事。他们能够滔滔不绝地谈每次战斗的日期和情况，以及千百个他们来往经过但别人从未听说过的地名；但是这些事件对他们之所以有意义，似乎只是因为他们作为集体而不是作为个人在那里创造了历史，只是因为红军到过那里，而在红军后面，存在着一种意识形态

的整个有机力量，他们就是在为这种意识形态而战斗。这是一个有趣的发现，但却使我的报道工作发生困难。

一天晚上，当我的其他问题都得到答复以后，毛就开始处理我标有“个人历史”这个问题的表。当他看到“你结过几次婚”这个问题的表时，笑了一笑——后来传出谣言说我问毛（至少他是主张一夫一妻制的）有几个老婆。不管怎样，他是怀疑有必要提供自传的。但是我争辩说，从某一方面来看，这比其他资料更为重要。我说：“人们读了你所说的话，就想知道你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再说，你也应该纠正流传的关于你的一些谣言。”

我提醒他外间关于他的死亡的各种传说，有些人以为他能说流利的法语，有些人却说他是一个无知的农民，又有消息说他是一个半死的肺结核病人，有的则坚持他是一个狂热分子。他对人们竟然会把时间花在对他的种种猜测有点感到意外。他同意应该纠正这类传说。于是再一次审阅了我写下的那些问题。

最后他说，“如果我不回答你的问题，而是把我的生平梗概提供给你，你觉得怎么样？我认为这样会使人更容易理解些，而且最后一一回答了你的全部问题。”

“这正是我所需要的!”我大声说道。

在这以后的好几个晚上的谈话中，我们真象在密室谈话一样，蜷坐在那个窑洞里的一张铺着红布的桌子旁边，蜡烛在我们中间爆着火花，我记笔记直到晒得要打盹了。吴亮平坐在我身旁，把毛的柔和的南方方言译成英语，在这种方言里，一只鸡的“鸡”字不是说成地道北方话的“chi”，而是变成带浪漫味道的“ghii”，“湖南”不是“Hunan”，而是“Funan”，一碗“茶”念成一碗“ts'a”，还有许多更奇怪的变音。毛是凭记忆叙述一切的；他一边说我一边记。我已经说过，这个笔记又被重译成中文并经改正。除了耐心的吴先生所作的必要的文字修改以外，我没有企图对它进行文学加工。下面就是原文。

“我一八九三年生于湖南省湘潭县韶山冲。我父亲的名字是毛顺生，我母亲出嫁前的名字是文其美。

“我父亲是一个贫农，年轻的时候，因为负债过多而被迫当兵。他当了很多年的兵。后来，他回到我出生的村子，通过做小买卖和别的营生，用心节约，积下一点钱，买回了他自己的田地。

“这时我家成了中农，拥有十五亩田地。这些田地每年可以收六十担谷。一家五口，每年食用共三十五担——即每人七担左右——有二十五担剩余。利用这个剩余，我父亲又积蓄了一点钱，过了一段时间又买了